

一种关注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当“30+”女性成为近期大众文化产品中一个亮眼存在,并接连引发热议,是时候讨论一个话题:

我们需要怎样的成熟女性剧?

桂琳

这些形象是如此复杂多面,让我们看到长期的双重标准对女性的主体身份认同带来混乱和迷失

女性处境是波伏娃《第二性》讨论女性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她认为对女性的各种指控和标签不是先天形成的,而是由女性的处境造成的。随后她从经济、社会、历史的各种制约中来把握在男权主宰的文化中所加在女人身上的各种“女性气质”。波伏娃的论证思路所带来的启示在于,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历史的状态下,女性处境会呈现出差异和变化。以近几年的海外女性剧为例,从《傲骨贤妻》到《傲骨之战》,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日益被淡化,而将女性直接放置在同男性在社会职业空间的竞争和合作表达上。《使女的故事》更是以女性主义视角去展开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反乌托邦思考,将女性问题与整个人类命运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些女性题材的拓展显然与海外女性的处境密切相关。但是,如果完全按照此类剧情和人物来拍摄中国当代女性剧,不仅会丧失对中国当代女性真实处境的洞察,有可能造成对本土女性处境的无视与遮蔽,更无法获得观众真正的共鸣。前些年大量复刻欧美小姐电影的国产小姐电影的惨淡结局就是一个先例。

戴锦华曾经用花木兰困境来形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女性处境。一方面,女性在真实参与历史的同时,其主体身份却消失在一个男性的假面背后。另一方面,她们在家庭中所出演的仍是极为传统和经典的贤妻良母角色。这导致她们遭遇着分裂的时空经验,承受着分裂的生活和自我。我们沿着这个思路来观察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女性,发现花木兰困境仍然是观察其生存处境的有力视角。而且由于社会状态的复杂变动,当代中国女性的花木兰困境也呈现出更缠绕和极端的状态。

首先,对女性的双重标准导致网络舆论对女性更强烈的双重不宽容,比如一边是视频网站上点赞数过万的鄙视杨丽萍没有孩子就是不幸的言论,另一边则是papi酱因为孩子冠父姓同样遭到网友讨伐。其次,这种长时期的双重标准对女性的主体身份认

同带来混乱和迷失。她们有可能将社会时空的男性假面形象作用于家庭空间中,出现渴望成为家庭之主的强势女性形象,比如《小欢喜》中的宋倩,《万箭穿心》中的李宝莉等;但同时,她们也有可能将自己在家庭空间中的贤妻良母作用于社会空间,对男性权力形成一种潜意识的臣服,限制了她们在社会空间的自我实现。众多大女主剧中玛丽苏形象的反复出现,就是在强化女性在社会空间的成功摆脱不了男性权力的加持。而大量职场情节中将女性的职场竞争者也设定为女性,比如《小欢喜》中的童文洁和珍妮,《三十而已》中的王漫妮和琳达,变相肯定了女性无力与男性竞争的职场生态。

《三十而已》中顾佳形象能够点燃众多讨论以争奇斗艳,正是因为这个形象击中了当代女性对自身处境的正视与反思。顾佳既是烟花公司真正的领导者,又是家庭中的贤妻良母,表面上看来在两个空间都表现完美,实则更深处处于花木兰困境之中。为了应付在双重空间的角色,顾佳必须在双重标准下都不断给自己加压,所谓完美实际是不堪承受的重负。从顾佳的社会空间奋斗可以看到,越是如顾佳这样有能力和野心的女性,反而更容易被规训到成功学的框架之下,不断膨胀的物欲埋下了剧后半段家庭悲剧的根源。顾佳在社会空间的男性化形象也影响到她在家庭中的角色,将本应该平等的夫妻关系变成对丈夫的控制支配和过分呵护,导致家庭关系的失衡以致最终解体。

顾佳形象对《三十而已》产生轰动效应功不可没,这一点从观众期待顾佳离婚的全网狂欢到对完美家庭主妇是不是独立女性的争论中可以窥见一斑。这也说明只要洞察并成功再现中国当代女性的真实处境,国产30+女性剧就有可能引发观众共鸣,成为爆款。而且因为电视剧更强烈的日常性和超长的故事流特点,早已代替电影成为真正的公共讨论空间。更多对中国当代女性处境真实刻画的30+女性剧甚至有可能成为当代女性自我教育的重要载体。

女性独立与女性情谊:更丰富的讨论内容都等待更多30+女性剧努力展开

近年来越来越多讲述女性在社会空间成功的国产大女主剧亮相屏幕,但却让观众日益产生审美疲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中充斥了大量玛丽苏形象。

玛丽苏模式与让女性通过嫁给有钱有势男性来改变命运的灰姑娘叙事异曲同工,不过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独立奋斗编造的新套路。好莱坞还发明了一种更隐蔽的对女性独立奋斗的收编叙事,通过爱情来置换女性对财富和地位的追求。最有名的是《蒂凡尼的早餐》,这部小姐电影的开山之作中,通过一个小职员底层女性到纽约打拼的故事和她对物质财富的渴望,去触及都市单身女性这个新群体的出现。赫本扮演的霍莉一心要通过征服有钱有势的男人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最终却被贫困男友的爱情唤醒,完成了一个爱情战胜欲望的神话。

这些形形色色的收编套路以温暖抚摸或利诱为女性反复洗脑,让女性将放弃独立奋斗当作自己的自由选择。当《三十而已》中的小镇姑娘王漫妮大胆宣布自己的男友条件是既要有钱又要有趣时,实际上是说出了很多都市30+女性的内心真实欲望与侥幸,不肯面对这两个条件之间实际并没有必然的关联。但当王漫妮如升级打怪一般闯过梁正贤的渣男关、张志的暖男关、姜辰的经济适用男关、最终与职场老手弗兰克直接交锋,白描了一个女性与男性在职场上的较量故事时,我们不禁为她叫好,也让我们有理由去期待国产30+女性剧能更多正面书写真正的女性独立奋斗故事。

如何摆脱各种收编成长为真正的女性主体?如何不再将爱情追求与事业追求作为对立物?更丰富的讨论内容都等着更多的30+女性剧努力展开。

与此同时,女性“奋斗”是传统男权社会最锐利的武器之一,其余毒

在当代一些大受欢迎的女性剧中还能大量看到。比如在大女主剧中将大女主的智勇双全与其他主要女性角色的邪恶狠毒形成正反两面刻板化的叙事,其实是男权框架叙事中女性天使与恶魔形象对立的变形。“两女抢一男”的隐含人物关系则在女性婚恋题材中大量存在,《我的前半生》《三十而已》都是让“小三”成为最重要的叙事功能性角色。所以戴锦华才痛心地指出当下文化的性别想象中深刻存在着“多妻制”的幽灵。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30+女性剧中如何塑造女性情谊变得尤其重要。海外众多女性剧都是展现群像式的女性形象,十分注意刻画女性人物之间的情感互动与生活互助。国产女性剧在展现女性情谊时目前看来误区连连,比如《欢乐颂》用金钱关系作为女性情谊的衡量标准,三个在金钱上面面临更多困境的女性对两个有钱的上流女性赤裸裸的赞美、崇拜与依赖就是所谓女性情谊。而《我的前半生》更是出现闺蜜之间抢男友的狗血剧情。《三十而已》在女性情谊的展现上已有了一定的进展,但如何展现三个女性各自的人格魅力,如何在集体情感中保持自身的主体性,这些都还有很大的展开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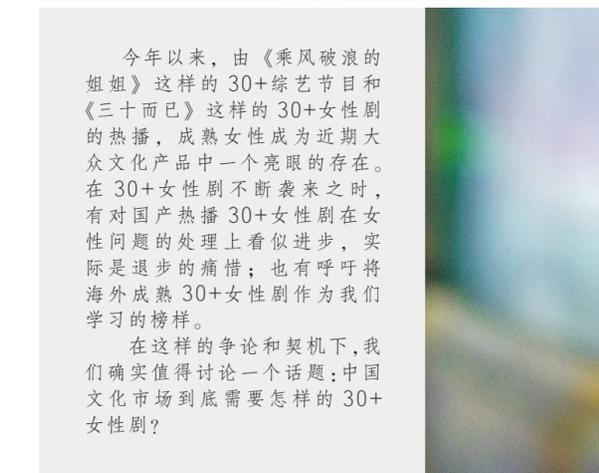
而以女性情谊来挑战男权结构的深层弊端的国产女性剧则更是令人期待。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最终的高光时刻就是通过陪泳女和家庭妇女女性情谊的象征性胜利,表达了对以男性主导的工具理性和丛林社会规则的深刻讽刺。真希望这样有力度的女性情谊也能够出现在国产女性剧中出现并大放光芒。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小欢喜》中的宋倩呈现出渴望成为家庭之主的强势女性形象

《三十而已》中顾佳的形象击中了当代女性对自身处境的正视与反思



今年以来,由《乘风破浪的姐姐》这样的30+综艺节目和《三十而已》这样的30+女性剧的热播,成熟女性成为近期大众文化产品中一个亮眼的存在。在30+女性剧不断袭来之时,有对国产热播30+女性剧在女性问题的处理上看似进步,实际是退步的痛惜;也有呼吁将海外成熟30+女性剧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这样的争论和契机下,我们确实值得讨论一个话题:中国文化市场到底需要怎样的30+女性剧?

“第三只眼”看文学

从阿尔巴特街出发的浪漫与现实……

——看钟求是的长篇小说新作《等待呼吸》

潘凯雄

“杜怡仍新鲜地记得,他和他的第一次相遇是在阿尔巴特街”。钟求是的长篇小说新作《等待呼吸》就是以这样的叙述拉开了帷幕。

坐落于莫斯科河畔的阿尔巴特街,虽蒙有五百年的历史尘埃,迄今依然是莫斯科现存的最具俄罗斯风情的一条步行街,这里不仅古朴与现代并存,而且商业与艺术兼具。大诗人普希金1831年与时有“俄国第一美人”之称的娜塔丽娅·冈察洛娃结婚后就定居在这里,度过了自己三个月的美好幸福时光。而我们这一代人中有不少则是从现代俄罗斯作家阿纳托利·纳乌莫维奇·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中了解到上世纪30年代居住在这条街上的苏联年轻一代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由作品打头的一句叙述扯出这样一段闲篇,其实是在表达自己已在刚进入这部作品阅读时的一段主观猜测:《等待呼吸》莫非也是要讲述一个浪漫而现实的故事?

整部《等待呼吸》被切割成三个部分。第一部“莫斯科的子弹”,虽有“子弹”这个“不祥”之物,但总体上仍是浪漫之气充盈着绝对的空间。上世纪90年代初的莫斯科,中苏(联)关系刚刚开始回暖,友谊大学的女留学生杜怡怀着青春的憧憬,穿过拉手风琴的老

头和拉手提琴的姑娘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留学生夏小松在阿尔巴特街邂逅。学俄语的杜怡,受到的熏陶是黄金、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阿尔巴特街的女儿》和《日瓦格医生》是她的枕边书;学经济的夏小松更是为了亲身感受当时国际经济学论争的前沿而放弃了留学美国的机会,他可以在自己的胸前纹上一个巨大的马克思头像,也会去莫斯科的地铁里,旁若无人地高声朗诵《资本论》。这样一双青年男女,同样的他乡寂寞,同样的青春萌动,迅速进入热恋再正常不过。尽管当时他们的热恋不过只是在周末的时光才能猫在宿舍里地点土豆烧牛肉、西红柿炒鸡蛋,在自习室研修“爱情课”,坐地铁穿越列宁山、伏龙芝、文化公园等站点,看纪念十月革命的红军阅兵,排着长队吃麦当劳,到俄文老师家度假,当然还有无数关于理想、未来、社会、学问的窃窃私语……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变,在莫斯科的这双恋人絮语还会继续呢喃下去;然而在白宫前那颗流弹击中了夏小松的胸膛,这一切不得不戛然而止……

到了作品第二部“北京的问号”,夏小松的离世不只是一条生命的终结,更意味着一个浪漫的时代被画上了句号。为了给夏小松治伤,杜怡从卷毛那借了5万块钱,而今恋人已去债务依旧,莫斯科已然无法回去,回老家也挣不出还债的钱。温馨的恋人絮语为悲怆艰难的日子所替代,痛失至爱的杜怡从浪漫的爱情巅峰一下子坠入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那是她人生一段至暗的时刻。为了还债,通过昔日同窗丝丝的介绍,杜怡不得不到一个前卫艺术展去做兼职人体模特,和其他几个女孩一起躺在地上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这一名为“天问”的行为艺术何尝不是深藏于杜怡内心那个巨大的问号?还是为了还债,杜怡只好成为一个寄居京城下室的“北漂”,她先后给不正经的书法家潘如钊做模特,靠出卖自己的后背给他当“宣纸”写字;给孩子做家教,却被家长戴宏中当成治疗自己隐疾的工具;最后遇上胡姐儿。这位“大人物”的“神通”背后无非是运用有权人的各种资源编织起一张巨大的关系网,从事着

权力寻租与政治搭客的勾当。认清了真相的杜怡,最终只能以付出一根手指的代价才挣脱这个充满着浓郁二氧化碳的“江湖”。

于是,这就有了作品的第三部“杭州的氧气”。这一部分的叙述变成了年轻一代的主人公章朗,透过这个“第三者”的视角,作品清晰地传递出三条信息:一是这些年吸纳了太多二氧化碳的杜怡终于回到了自己家乡的首府杭州,开了一家旧书店为生,这里多次出现孟京辉话剧《恋爱的犀牛》中的插曲《氧气》,这显然是一个充满了象征性的符号;二是多年前的那场爱情在杜怡的精神深处已然留下了一道不可愈合的伤口;她已经缺乏再次投入爱情的能力,即便付出自己的身体,那种内心的高度契合也完全无从寻找;三是杜怡看似认同了在情爱中身体与精神的区分,但它之间真的能分清吗?于是,杜怡与章朗虽然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杜怡却执意要独自抚养这个孩子,并将他命名为夏小纪。在她心中,这就是夏小松的孩子,内心执着的依旧是异国他乡与自己开始初恋的夏小松。作品的结束时,杜怡毅然带着孩子不辞而别地来到夏小松的家山西晋城,那里毕竟还有他的坟墓和他年迈的父母。若干年后,当章朗终于找了过去时,杜怡和夏小纪却不是在那贝加尔湖畔,就是在前往莫斯科的路上,因为那里有夏小松,哪怕只是他的气息。

经过对《等待呼吸》这样一番梳理,不难看出作品基本上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言情小说的叙述方式,但之所以说“基本上”是因为作品在既有言情小说基本叙述范式的基础上,又赋予了新的因子,从而使得这部作品所言之情有更多的社会与时代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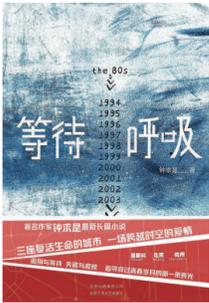
客观上讲,小说第一部分“莫斯科的子弹”当是典型的言情小说叙述方式。杜怡与夏小松在莫斯科街头邂逅,立即坠入情海,固然可以说出一些缘由,但那些缘由也完全不足以成其缘由,一双男女才貌无缘由地爱得死去活来就是典型的才子佳人模式,包括夏小松不幸意外罹难杜怡失情不移同样是这种模式的典型表征。我

样描述绝无丝毫贬低这部作品的意思,而完全是一种正面的积极评价。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文学作品越来越不会讲纯美且令人感动的故事,要么是为了所谓人性的复杂而刻意制造一些恶与脏的要素,要么是人为地在那煽情造作,不仅感动不了读者相反倒是令人反感和生厌。而钟求是笔下的这份情感纯粹干净、矢志不移,的确令人为之动容。更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将作品的三个部分贯穿起来看时,就得承认《等待呼吸》在传统言情小说的叙述范式上的确赋予了不同新的因子,因而使得作品在令人感动之余又多了些厚重与沉思。

在我看来,这所谓“新的因子”至少有两点格外鲜明的特征。一是作品自始至终都贯穿着鲜明强烈的时代感,仅此一点就大大超越了传统言情小说的叙述范式。在《等待呼吸》中,我们完全能够清晰地拿捏到自上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时代风云翻腾、社会发展变迁的脉搏,尽管作者丝毫没有正面触及,这就是一种本事。如果没有暗含这样的背景,作品中一些主要人物的行为就缺少合理的逻辑;二是如此鲜明强烈的时代感始终在暗中牵动着人物行为和心理的微妙变化,无论是夏小松放弃去美国留学而转向莫斯科,还是杜怡从勇敢的受到情与性的分离莫不都是时代的风云和社会的变迁在一个具体人心灵或行为上留下的细微烙印。将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社会的大势捆绑在一起同样也是传统的言情小说所完全没有涉及的。

当然,如果说《等待呼吸》还有什么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那就是在作品的第二和第三部分中,或许是为了突出杜怡情感忠贞和生活艰难的一面,因而对她的一些行为还缺乏一点必要的铺垫与交代,比如杜怡的家人在作品中明明“存在”却又完全“不存在”,要知道夏小松是公派留学生,而杜怡还是自费留学的呢。这样的家境在那个时代未必十分殷实但完全置之不顾总是不尽情理的了。这样的针脚虽细密,但如果全然不顾反倒难免会有为作而作之嫌了。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等待呼吸》钟求是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